

一曲琵琶诉衷肠, 众乐共谱《天地歌》

——评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协奏曲

幸雅童

新疆艺术学院

DOI:10.12238/er.v6i2.4881

[摘要] 《天地歌》是作曲家张朝创作的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作品,他巧妙借用西南民间音乐元素为作品塑造独特风格,既为西南音乐增添新彩,又赋予该民族管弦乐作品以新内涵。该作品在琵琶与管弦乐队的合作中极大地发挥了主奏乐器琵琶多声部音响的优势和利用空间,以四个主题动机编织出焕然一新的爱情故事。此外,不论是利用乐器旋律的线性行进勾勒出多声的音响效果,还是对民族乐器音色个性的巧妙运用,无不体现出作曲家对西南地区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 琵琶; 民族管弦乐队; 《天地歌》

中图分类号: J632.33 文献标识码: A

A Pipa Song Expresses the Heartfelt Feelings and All the Musicians Compose *Song of Heaven and Earth*

—Commentary on Concerto of Pipa and National Orchestra

Yatong Xing

Xinjiang Arts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ong of Heaven and Earth* is a work of pipa and national concerto composed by composer Zhang Chao, who skillfully uses elements of southwestern folk music to create a unique style for the work, which not only adds new colors to southwestern music, but also gives new connotation to the national orchestral works.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pipa and the orchestra takes great advantage of the multi-part sound of the pipa as the main instrument and utilizes the space to weave a new love story with four thematic motives. In addition, whether it is the linear progression of the musical instrument melody to outline the multi-voice acoustic effect, or the ingenious use of the timbre personality of the national musical instrument, it all reflects the composer'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usic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 region.

[Key words] pipa; national orchestra; *Song of Heaven and Earth*

《天地歌》是作曲家张朝受中央民族乐团之邀约,所创作的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2017年该作品在北京音乐厅进行首演。作曲家以云南和湘西两个地区的爱情故事为创作主线,将云南傣族的《召树屯与喃木诺娜》中充满美好理想和崇高英雄精神的传奇诗篇,和沈从文以湘西为写作背景的中篇小说《边城》中的翠翠和二佬之间的爱情故事,融合在一起,共同编织出《天地歌》这一首动人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笔者的研究版本为“苏州民族管弦乐团2019音乐季《信天游·天地歌》音乐会”中所演奏的,本次演出的琵琶独奏由青年琵琶演奏家董晓琳演奏,彭家鹏担任指挥。

1 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

与其他演奏单线条旋律的民族乐器不同,琵琶在现代许多作品中都体现出了它丰富的多声部音响特质,《天地歌》也不例外。例如呈示部乐器齐奏处,看似单薄的琵琶并没有被其他乐器快速的节奏和强有力的音响盖去锋芒,反而能够在不被丰富的音响占去风头的同时,做到与管弦乐队和谐统一,甚至宛若另一支独立的小型乐队与之共同协奏,产生更加磅礴多样的共鸣效果,展现出琵琶与乐曲旋律的独特魅力。

随着协奏曲进入中国以及民族管弦乐队在中国的逐步建立,作曲家们的管弦乐创作愈发注重民族传统的回归,作曲家不断挖掘琵琶在民族管弦乐队中的可能性,《天地歌》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之一^[1]。作为《天地歌》的主奏乐器,琵琶除了担任主

角之外,也出现在管弦乐队中兼任配器一角,在增添琵琶灵活性的同时,也极大地发挥了琵琶的利用空间。例如呈示部琵琶的华彩部分,乐队齐奏的磅礴音乐在转到琵琶独奏时并不显得突兀和孤单,这十分考验演奏者的功底,如若不然,突如其来的独奏会使琵琶落入孤零零的下场。董晓琳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反而通过琵琶深情的独白,生动形象地将恋人从初识的生涩一步步靠近彼此到相知相恋的过程描绘出来。

2 作品音乐结构的分层布局

该作品共有四个主题材料:浪漫曲、希望、婚礼、灾难^[2],作曲家通过这四个主题动机将两个爱情故事交织在一起,也将云南傣族和湘西这两个地区的音乐风格以作者独特的方式融合到一起,谱写出焕然一新的现代爱情故事。

作品的开头,拉弦乐器、吹奏乐器和弹拨乐器的声音依次渐起出现,以极弱的音量此起彼伏,徐徐地引出“浪漫曲”、“希望”、“婚礼”三个主题动机。拉弦乐器与吹奏乐器营造出广阔的空间感,仿若在天地之间拉开帷幕,令人忍不住联想到西南山区,云南湘西两地淳朴宁静的村庄和安逸悠扬的山水,“浪漫曲”和“婚礼”两个主题的出现和交替转换,舒展柔美的旋律仿佛召树屯和纳乌诺拉的相爱,又似是翠翠与二佬的浪漫相遇。随后琵琶与引子部分的婚礼主题相衔接,用清脆活泼的单音带出呈示部的主部主题——“婚礼”主题,琵琶对婚礼主题的三次呈示,象征着人们对浪漫爱情的美好向往。中胡与提琴以弱音量烘托出云雾缭绕的山区情景,高胡和二胡有规律地出现在琵琶独奏每一句的开头和结尾与之衔接,如同鸟雀在寂静山林间偶尔的啼叫,两个爱情故事也就在这天地间发展开来。随着打击乐器的加入,婚礼主题出现了第二次变形,不论是伴奏乐器还是主奏乐器,织体的丰富和节奏的紧凑都将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尤其是土家族特色的“打溜子”和“咚咚喹”元素出现,音乐的感染力加强,既是召树屯与纳乌诺拉的盛大婚礼,又像翠翠与二佬在欢乐节日中的相遇。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的衔接自然且迅速,琵琶独奏以快速的音型节奏将三个主题动机编织在一起,仿佛召树屯与翠翠二佬两个爱情故事的重叠。随着华彩部分琵琶意犹未尽的泛音渐弱,吹奏乐器的长音吹出副部主题“浪漫曲”的变奏,音乐转入寂静、辽阔的旋律氛围,爱情故事的场景从婚礼再次回到大自然的广阔天地。主奏乐器用富有颗粒性的单音和轮指技巧,与其他乐器相互呼应,如同在诉说恋人从初识的生涩一步步靠近彼此到相知相恋的欢愉与不易。

行进到象征灾难的展开部时,音乐色彩猛然发生变化,刺耳的旋律虽短小却令人心中止不住警铃大作。低沉有力的低音提琴如同晃动着主角们命运的灾厄步步靠近,模糊的调性和紧张的不协和和弦象征着此时主角生死未卜、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的困难境遇和纠结心情。随后以琵琶独奏的形式将四个主题动机再现并且交织展开进行演奏,既是召树屯为挽回纳乌诺拉突破艰难险阻所要面临的种种考验;又是二佬顾及手足之情放弃翠翠远走他乡的痛苦折磨。随着琵琶的几个连续强音终止,其他伴奏乐器与琵琶构成鱼咬尾衔接,一次又一次的转调渐强,也意

味着主角们的斗争在逐渐走向胜利和结束,“希望”主题逐渐呈现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希望”主题贯穿全曲,即使是在以“灾难”为主旋律,代表斗争和挣扎的展开部中,仍旧在最后转向了希望。这既是乐曲中心思想的表现,也是为再现部的升华做铺垫。

最后,再现部希望主题的完整再现,既是召树屯与纳乌诺拉厮守终身的爱情,也代表了翠翠坚守爱情,始终期待爱情的希望。一如作品所描述的两个爱情故事:“一个为了‘美’与‘爱’敢于用生命挑战巨大的灾难,一个为了‘美’与‘爱’敢于用一生去等待美好的爱情。”^[3]

3 《天地歌》音乐本体之分析

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之外,不论是旋律音响还是乐器音色都十分耐人寻味。作为一部现代创作的琵琶与民族管弦乐队协奏曲,除了现代语言独特的表达方式,还在音乐旋律和乐器音色上体现出了西南少数民族独特的音乐风格。

3.1 线性旋律编织的多声音响

作品从曲式结构来看,是较为典型的协奏曲,音乐整体呈现出悠扬柔美的旋律。旋律线条起伏较小,较少出现大跳,多是二度、三度的小跳或是和谐的纯四度、纯五度音程,节奏自由变换,尤其是慢板部分更加凸显出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音乐风格特征。当然,该作品旋律中不仅有云南傣族常见的倚音和颤音,还出现了湘西土家族特有的“咚咚喹”音乐元素和“打溜子”,及其调性上也出现了其他民族较少见而傣族独特的游离调性。

中国传统音乐结构的渐变思维在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作曲家以“鱼咬尾”的创作思维贯穿全曲,令整个作品更加耐人寻味。例如,引子部分过渡到呈示部的乐曲旋律就是通过连音线和反复的音型节奏连接起来的,但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通过速度和强弱的转变。在引子结尾处强收之后,大提琴和中阮以沉稳的音色与轻快的旋律弱起,预示着乐曲的开始。而直到主奏琵琶进入主题,大提琴的旋律仍旧保持直到琵琶完整地将“婚礼”主题展示之后才随着打击乐器的进入发生变化。这正是作品渐变思维的重要体现,乐器与乐器之间单向进行的旋律既相互独立,又能够在乐曲整体上达成统一的融合。同时,高胡和二胡采用的“轻弹蛇皮”技法也是旨在制造特殊的音响效果,通过音色和节奏型来与随后打击乐器呈现的“打溜子”相互呼应,起到铺垫和过渡作用。

这种创作思路贯穿全曲,在乐句、乐段之间相互映衬,使旋律在行进时具有中国独特的“渐变”之美感。乐器们独立行进的线性旋律并没有把彼此分割开来,而是通过鱼咬尾的手法进行具有复调性特征的“对话”,巧妙地通过对旋律进行有机的组合,编织成丰富的多声音响效果^[4]。

3.2 民族乐器音色个性的巧妙运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在创作民族管弦乐作品时致力于探索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创作,音色在乐曲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也开始被重视起来。《天地歌》巧妙地通过利用乐器自身的独特音色,

在参考西方的编制对乐器进行整体分配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乐器间的音色和演奏技法的特点,极大地发挥了琵琶、唢呐和笛子等这些中国民族乐器的独特优势,使作品在吸收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依旧拥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首先是独奏乐器琵琶,琵琶的音色与月琴十分接近与相似,因此张朝对演奏技法和旋律进行了调整,使音乐旋律更加富有西南少数民族的风格特征。月琴的音量较小,音色清脆柔和,是少数民族常用的乐器之一,在演奏尤其是按音时要求力度一定不能太重;反观琵琶的声音穿透力更强,尤其在弹奏高音时,音色清亮且刚强。为了减弱琵琶音色的清亮,张朝大量地运用了琵琶中少见而月琴常用的演奏技法“虚按弦”,即在演奏时并不完全将弦按实。如此处理方式使琵琶从细节处更加贴近月琴音色,并且音高轻微的不稳定与拉弦乐器“轻弹蛇皮”音响效果相互映衬,反而增添了几分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神秘感。同时,作曲家也通过泛音极好的发挥了琵琶本身清亮的音色,如在紧张刺激的展开部中,琵琶用泛音反复弹奏“希望”主题旋律,与压抑的“灾难”主题形成鲜明对比,给予听众一种拨开云雾见青天的听觉感受,直到正式进入再现部,沉闷的气息才彻底被打破,光明的“希望”展现在众人面前。

其次,唢呐在传统音乐中常用于喜丧,在渲染音乐氛围上能够起到极为有效的作用,但唢呐的尖锐音色在烘托气氛的同时,也常常难以融入乐队合奏中。该作品更是在快板旋律中巧妙地加入唢呐,不仅没有导致乐器音色不融合地突兀感,更是通过唢呐和音乐节奏配合,加之以笙自身的“和声”属性,反而与急促的整体旋律相辅相成,使该作品虽然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感和戏剧性效果,但始终给人以一种张弛有度的听觉感受。

最后,作曲家利用乐器的音色特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乐器进行模仿,使作品的民族音乐风格更加突出。作者不仅巧妙地利用管弦乐队中的乐器模仿打溜子以及咚咚咚的音色,同时还创造性地为本属于无音高的打击乐在利用其他乐器表演的过程中呈现出了具有音高的音响效果。除此之外还采用曲笛兼以

葫芦丝和巴乌这两个典型的傣族音乐风格的乐器角色,创造出了富有西南音乐风格特征的旋律。

4 结语

随着协奏曲在中国本土化的发展以及创作观念的变化,作曲家在协奏曲的创作时更加注重开发和利用中国民族管弦乐自身的特点,将中国地域性的民族音乐风格呈现出来,《天地歌》无不例外地体现了作者对民族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5]。

该作品虽然是较为典型的协奏曲形式,但通过对意境的整体把控,将中国音乐传统的渐变性思维与西方作曲技法完美契合,使得这首以西方体裁为框架的作品成为富有西南民族音乐特色的作品。在音乐风格方面,作者以两个爱情故事为题材,提取包括打溜子和咚咚咚在内的西南民族民间音乐元素作为旋律素材,创造出了富有西南音乐特征的旋律。此外,作者通过民族乐器自身的独特音色,将西方乐队与民族乐队巧妙结合,在极大限度上发挥了琵琶、唢呐和笛子等这些中国民族乐器的独特优势,使作品在吸收西方音乐文化的同时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民族本色”。

[参考文献]

[1]应锦阳.文化碰撞与融合中琵琶音乐的发展[D].上海音乐学院,2014.

[2]李卓娅.《天地歌》音乐分析[D].中央民族大学,2019.

[3]张朝.琵琶与管弦乐队协奏曲《天地歌》[M].现代出版社,2017.

[4]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M].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5]胡志平.新型民族管弦乐队与中国传统音乐资源——对民族管弦乐队发展现状的审视与思考[J].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7(01):71-77.

作者简介:

幸雅童(1999--),女,汉族,江西省赣州人,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